



FOCUS

高层动态

2022年3月14日

兰瑞智库
经济战略研究

指点江山

思入风云

菩提明镜

大道之行

主办：兰瑞智库经济战略研究中心

<http://www.runwaysys.com>

全国客服热线：4001182162

E-mail: runwaysys@163.com

在中国的国情下，中央高层的行为、语言、倾向，会对政策、宏观环境产生重大的影响。

在中国，要做出正确的决策，必须把握政经趋势，而把握政经趋势，最不确定性的因素、最难把握的是中国的国情，而可能破解这一难题的，正是对中央高层动向的动态分析。

哪些问题受到高层关注？哪些人的思想在影响高层的决策？我们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又该如何采取针对性措施？

本报告力图提供一个关键性的分析框架，将中央高层动向及其影响分析与政经趋势分析相结合，从而达到把握最重要的决策要点的效果。

本报告力求提供的参考意见是有价值的，望您善加利用并慎重决策。



本期目录

最新动向	3
【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闭幕】.....	3
【全国人大十三届五次会议闭幕】.....	4
问题探射	6
【建议税制改革以鼓励富裕群体捐赠】.....	6
【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监管政策法治化更利长远】.....	7
【进一步完善金融大数据管理的五个建议】.....	10
人物关注	11
【李荣灿任湖北省委副书记】.....	11
智囊高参	12
【王格玮、赵耀辉：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12
【姚洋：GDP 目标增长 5.5%左右 优势在财政和货币政策】.....	17
虎视寰球	20
【伊核会谈暂停 达成协议希望犹存】.....	20
【尹锡悦当选 韩国内政外交走向何方】.....	22
【面对乌克兰难民 欧盟这次不一样】.....	23
华夏透视	25
【消费势头仍疲软 2022 稳消费面临压力】.....	25



最新动向

为什么要对中央高层的最新动向紧密跟踪？因为他们的行为、语言、倾向，会对政策、宏观环境产生重大的影响。可以这样说，在中国，要做出正确的决策，必须把握政经趋势，而把握政经趋势，最不确定性的因素、最难把握的是中国的国情，而可能破解这一难题的，正是对高层动向的动态分析。对高端决策来说，高层动向的紧密跟踪是研究分析的关键性资源。

【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闭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3月10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号召，人民政协各级组织、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奋发进取，勇毅前行，以实际行动迎接中共二十大胜利召开，为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议通过了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政治决议。

汪洋在讲话中说，这次会议广泛汇聚正能量，开出满满精气神，是一次高举旗帜、民主团结、求真务实、简约高效的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出席大会开幕会和闭幕会，深入界别小组听取意见，与委员共商国是。全体委员认真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审议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等文件，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深入协商议政。委员们一致表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深刻认识新时代的创新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切实增强“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要把迎接中共二十大、学习宣传贯彻二十大精神作为今年重大政治任务，在思想引领上求实效、在协商建言上出成果、在服务大局上有作为，为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贡献政协力量。

汪洋强调，今年是十三届全国政协履职的最后一年。在本届政协第一次会议闭幕会上，我们提出要准确把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个政治组织赋予我们的责任，强调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履职尽责、必须求真务实提高协商能力水平。四年来，我们认真践行这些工作原则和理念，增强了政治能力、为民情怀和协商本领。在新征程上，践行这些原则和理念必须一以贯之、做得更好。要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切实担负起把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和对人民政协工作的要求落实下去、把海内外中华儿女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的政治责任。要坚持履职为民，深入实际察民情，献计出力解民忧，春风化雨



聚民心，倾听人民呼声，反映人民诉求，集中人民智慧，紧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议政建言，把委员作业写在中华大地上、写到界别群众的认可里。要进一步提高协商质量、健全协商制度、培育协商文化，注意总结新鲜经验和做法，不断丰富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制度化实践，真正做到遇到问题多协商、双向互动会协商、坦诚相见真协商、充分交流深协商。

汪洋强调，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高举理想信念之旗，高扬团结奋斗之帆，笃行不怠勤履职，再接再厉续华章，交上一份五年期的合格答卷，以实际行动迎接中共二十大胜利召开。（据新华社）

[Top](#)

【全国人大十三届五次会议闭幕】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3月11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大会批准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等。大会通过关于修改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决定，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110号主席令予以公布。大会通过关于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决议指出，会议高度评价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2021年国家发展取得的新的重大成就，充分肯定国务院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2022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政策措施和工作部署，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决定。决定自2022年3月12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根据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关于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根据关于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于2023年1月选出。

会议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关于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决定批准关于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关于202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决定批准关于202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2022年中央预算。

会议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决议指出，会议充分肯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过去一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今后一年的主要任务，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决定批准这两个报告。

随后，栗战书发表讲话。他说，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已经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会议审议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地方组



织法的决定,关于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两个办法。会议取得的成果,展现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征程上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新的重大成就,进一步激发了全国各族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意气风发、步调一致向前进的坚定决心。

栗战书指出,本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履职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党和国家事业大踏步前进的时代背景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也取得了新的成绩。这从根本上得益于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在新的奋斗征程上,必须深入学习和认真贯彻这一全新政治制度理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得益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一宪法核心原则,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最为根本的就是确保党的指导思想、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确保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得以全面实现;得益于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要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得益于依法正确行使权力、履行职责,既支持“一府一委两院”高效推进各项事业,又确保行政权、监察权、审判权、检察权依法正确行使;得益于着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推动人大制度和运行机制更加完善更加定型,有效保证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栗战书指出,本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履职以来,各位代表肩负党和人民重托,积极参加会议审议,提出高质量、有分量的议案和建议,从不同角度参与重要法律的制定修改,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要保持永不放松、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认真履行代表职务,在各自岗位上作出新的更大成绩。

栗战书说,今年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十分重要的一年。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深刻认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新使命新任务,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全面实施宪法,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法监督“一府一委两院”工作,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全面提升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据新华社)

[Top](#)



问题探射

哪些问题受到高层关注？哪些问题将被高层关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问题的发展和解决方式将怎样影响相关问题和同类问题？这些问题又如何影响我们的宏观环境？我们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又该如何采取针对性措施？本栏目通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使得我们对于高层动向的追踪变得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功能性，其方法对我们的决策分析具有启迪意义，也将极大提升我们的决策分析的利用价值。

【建议税制改革以鼓励富裕群体捐赠】

“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我们当前的目标还是应该以效率优先来提升公平，效率优先的意思就是把蛋糕做大。”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余淼杰3月9日接受中新网“中国新观察”栏目专访。他在谈及当前为实现共同富裕的远景目标该如何着手的问题时如是说。同时，对于目前社会上“民营企业退场论”、“削弱市场经济”、“劫富济贫”等对于共同富裕的模糊认识，余淼杰在专访中也给予澄清与反驳。

■ “提低”——“不能老是靠输血，要有造血的功能”

2021年，我国GDP(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4万亿元，位于全球第二位。2022年经济增长目标定在了5.5%左右。“按照这样的经济增速，五年左右时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与美国持平的规模是没问题的，这是第一步。接下来，我们还需要把人均GDP进一步提升来，这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余淼杰说。

因此，余淼杰认为，促进共同富裕短期的工作首先是要防止脱贫的人返贫，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然后做好乡村振兴工作，帮助低收入群体提高收入。

他解释道，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形成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核心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一方面政策上要保证低收入群体生活有保障，另一方面要帮助一部分低收入群体上升到中等收入群体来。

“所以，不能老是靠输血，要有造血的功能，贫困地区也应该有产业基础，我国的加工贸易产业正在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内陆省份转移，这就是一个机会。”

■ “扩中”——需要保就业、保市场主体

目前，社会上对于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有一些模糊的认识，比如“民营企业退场论”、“削弱市场经济”等，余淼杰认为，这些说法都不可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范围，首先就是要让更多的人有工作，而保就业的核心正是要保市场主体、保中小微企业。目前在疫情冲击之下，一些中小微企业经营压力变大。余淼杰认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相关支持政策，比如通过稳健的货币政策进行纾困，针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企业给予融资支持；财政政策则是进一步减税降费，降低企业经营压力。“如果企业有活力，就能增加就业机会，更多人能上班拿工资，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就会上升，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人民生活变好，社会



更稳定；中等收入群体扩大还会拉动内需，进一步提振经济，形成正向效应。”

■ “调高”——税制改革以鼓励三次分配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多位企业家提出鼓励民营企业投身社会公益事业的建议。全国人大代表、小米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雷军就建议，在政策层面探索新型捐赠方式，特别是鼓励民营企业提供专业服务捐赠，同时，在法律层面完善对非货币财产无形资产捐赠的认定。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多蒙德实业集团董事长石磊建议，进一步加大对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激励力度，符合法律规定的公益慈善事业的捐赠支出可享受税前扣除等政策支持，这样可以推动社会财富、社会资源在不同群体、不同人员之间的合理再分配。

余淼杰也认为，通过合适的税制改革，可以对促进共同富裕有推动作用。“我国个人年收入 96 万元以上，个税税率就是 45%，从缴税基数来说，个人 100 万左右的年收入很难算是顶级富豪群体，而且还需考虑家庭有几口人——赡养父母、养育子女的压力，因此个税改革可以从增加更多的档次、降低税率的角度考虑。”他还表示，针对真正的富豪群体，可以考虑通过遗产税等合理的税制设计，鼓励这一群体积极参与捐赠。“我们应该设置一个比较好的税收机制，在效率与公平中取得平衡，当然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循序渐进。”

【来源：中新财经，作者：余淼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Top](#)

【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监管政策法治化更利长远】

一、劳动力市场有较好恢复但尚不充分，今年就业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从经济学原理角度看这个问题涉及奥肯定律。奥肯定律把劳动力市场因应宏观波动发生的丰富变动归结为失业率单个指标，认为宏观经济波动跟失业率存在耦合关系。这个简单模型对发达经济体有一定解释能力，不失为讨论宏观短期波动与劳动力市场关系的起点模型。但是过去十几年这个模型即便在美国这样发达国家表现也出现一些新情况，比如说分段估计奥肯定律方程其估计系数发生显著变化，提示其潜在产出以及失业率与宏观波动联系量化程度在变化。另外劳动参与率这个过去认为是劳动市场的长期变化指标，也由于“疤痕效应”等因素在短期冲击后出现某种结构性下滑等等。所以，从美联储加息会议纪要看美联储讨论货币政策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经常会关注失业率之外的其他劳动力市场指标变化，以求研判形势时比较全面准确。

对于我国来说教科书奥肯模型的局限性更大。十几年前我们做了一项有关广义奥肯定律和中国奥肯关系的研究，结果发现由于中国经历体制安排和发展阶段两重意义转型，宏观波动与劳动市场关系具有与教科书模型显著不同的内涵。具体说就是改革时代最初 30 多年宏观经济波动与失业率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但是与农业劳动力转移具有更为密切和显著的关系。这个结果显示，在我国二元经济转型的最初几十年，宏观经济波动对劳动力市场引入的冲击，主要是通过农民工在农民和工人之间职业转换来承受和消化的，城镇失业率的两次巨大波动主要与体制改革突破消化计划经济遗留隐性失业有关。

过去两年疫情期间我国宏观经济再次发生剧烈波动，为理解中国奥肯关系是否发生了显著变化提供了一个天然的经济实验环境。基于上述分析思路，对疫情



劳动力市场变动可以从失业率、农业劳动力转移增量、城镇新增就业等几个指标观察理解，今年就业形势也可在此基础上讨论。主要结论是：随着疫情常态化后宏观经济较好复苏，我国劳动力市场也有较大程度恢复，然而与充分就业还有一段距离，如何实现疫情前政府提出的更加充分就业目标仍面临现实困难。

第一从失业率指标看，这次疫情波动下失业率走势表现出与一般规律相一致的反向走势。我国失业率指标较特殊，政府有关部门公布“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两个失业率指标。近年失业率数据表现出两方面特点：一是失业率波动显著，对宏观经济的波动做出了与理论预测关系相一致的反映，说明失业率与宏观波动更加具有市场经济环境下应有的联系方式。二是失业率反应程度和灵敏度仍然偏低，如2020年宏观经济相对收缩程度在改革时期极为罕见甚至仅见，然而登记失业率升幅仍略低于近20年的两次阶段性峰值。另外，在失业率统计、失业救济政策等方面还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问题。

第二个指标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增量。2020年疫情冲击下经济增速大幅，伴随农民工转移增量减少520万，代表改革开放时代这个指标的最大收缩值，与宏观经济相对潜在增速的收缩程度具有数量级意义上的对称性。伴随2021年宏观经济反弹恢复，农民工增量也反弹增长到690万，显示目前农业劳动力转移仍是吸收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甚至主要管道，也是中国奥肯关系方程中显著度更高变量。不过去年农民工增量虽大幅反弹，疫情期两年平均值仍与疫情前多年均值存在相当缺口，从一个角度提示劳动力市场和就业恢复仍不够不充分。另外去年外出农民工占比显著下降，也对农民收入带来不利影响。

第三个指标是城镇新增就业，2021年城镇新增就业指标有明显恢复，然而两年均值与疫情前七八年该指标平均水平相比仍有显著缺口。总体来讲，我国劳动就业和宏观经济复苏都取得了很好进展，然而就业仍然存在复苏不充分的问题，这与宏观经济增长面临去年年底经济工作会议讲到的“三重压力”自然有联系。另外与疫情持续影响经济也有关系，我国疫情防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同时也付出了一些经济代价，其中包括对增长制约特别是消费某种拖累作用。

进一步看目前“需求收缩”主要是内需不足，外需反倒相当给力。2020年和2021年我国净出口对增长贡献率分别高达27.4%和21%，两年平均贡献率为22.4%，作为比较疫情前十年净出口对总需求平均贡献是负值。过去两年疫情期的特殊环境下，受内外环境多方面原因推动，我国外需再次出现与世纪初年可比的超预期高速增长。给定这个背景条件，我国经济最近面临新的下行压力，投资和消费内需不足显然是主要原因所在。换言之，如果没有外需超常增长的额外支持，我们的需求收缩压力会更大一些。

就今年劳动力市场和就业形势而言，2022年预计大学毕业生人数预计将比上年大幅增加167万人，第一次超过千万门槛达到1076万人的创纪录水平。另外进入劳动力市场求职的还有400-500万中专毕业生、几十万退伍军人和一定数量中学毕业生等等，新增求职人数会达历史新高。然而给定目前经济下行压力，2022年宏观经济稳增长任务繁重，会对就业创造构成宏观制约。因而2022年实现充分就业目标困难较大，劳动力市场和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也存在有利条件，如1962年由于历史原因新生人口规模特别大，按照60岁退休年龄规定，今年有较多男性就业者到了退休年龄会退休，腾退出来部分工作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舒缓就业压力。总体还是应看到今年就业压力问题不小，就业形势不容乐观，需要采取积极宏观政策和结构性促进就业政策加以应对。



二、灵活就业是新时代就业的重要趋势之一，监管措施法治化更符合长期发展要求

简单讲两点问题。第一，我觉得易教授主报告对新就业形态做得比较系统考察很有意义，这里也谈一下新就业形态重要性和成因背景。粗略观察过去十余年我国就业总量和结构变化有几个大数：一是总量从 7.2 亿到 7.6 亿，增加了 4000 万。二是农业劳动力占比下降总共转移出 7000-8000 万。三是制造业从 2014 年峰值到目前减少就业 3000 万，但是制造业以外第二产业就业可能扩大上千万就业。四是服务业从 2.7 亿增长到 3.6 亿，增长约 9000 多万。与部门就业量变化同时发生的就业形态转型，突出表现为与所谓“零工经济（gigging economy）”相联系的灵活就业快速增长，从 2003 年不到 5000 万增加到现在的 2 亿多，过去十年估计增长 1 亿上下，成为就业形态演变的支配性因素。

就业零工化和灵活化的强大趋势，背后有经济发展阶段与技术变迁等时代环境因素推动，也有年轻一代求职人员主题禀赋条件演变的影响。首先是城市化高速推进、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和超大城市快速扩容的产物。大城市特别是特超大城市人口增长，对于社会化便利服务提供大量需求，其超强集聚效应使得从事这类灵活就业能够获得各种细分市场机遇，并能够快速派生和发掘规模经济。其次是易教授报告强调的现代互联网技术和支付手段迅速发展，提供了满足需求的供给条件。网络和数字经济以前时代经济运行也提供传统灵活就业机会和需要，比如街边大碗茶、修鞋匠、卖冰棍等自谋职业者以及钟点工、家庭帮工等，但是现代网络数字经济发展普及，通过各类平台经济和网络化提供了大规模的各类新型灵活就业机会。新冠疫情冲击加速经济数字化和“线上化”进一步推动了上述趋势。最后，年轻一代劳动者家庭经济负担代际变化以及平均受教育程度上升，使得他们对灵活就业可能发生的摩擦性失业承受能力上升，对灵活就业较多具有的自由度和可选择性偏好提升，从主体方面推动了灵活就业兴起。

第二谈一下刚才伍戈首席分析的平台经济监管问题。针对平台巨头在数字经济转型过程中垄断地位和影响力提升，创新反垄断体制政策成为一段时期以来全球范围的趋势性潮流。国内也是如此：2017 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修法增设互联网条款，2018 年新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统一反垄断执法，2019 年 38 号文件对平台经济提出系统规范要求，直至 2020 年初启动《反垄断法》修订进程……可见加强对平台经济的规范监管早已开始，前期主要通过渐进性修法修规引入对平台经济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监管和规范。2020 年底以后这个进程加快，推进方式也明显变化，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强化反垄断措施，包括对“二选一”竞争方法的高额罚款、叫停并购案、暂停或永久性中断重大平台公司上市过程等等。同时提出涉及面更普遍的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要求，形成现在人们熟悉的“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表述。

密集型高强度反垄断举措很快取得明显成效。例如遏制平台企业宰熟、过度索取消费者个人信息、隐含霸王条款等损害消费者权益问题有明显进展，对互联网巨头利用算法技术对外卖骑手过度索求的必要监管问题提上讨论议程，平台巨头的公益意识也得到提升。同时强化反垄断也提出一些有待厘清和完善的问题。例如一般而言资本和企业投资经营无疑应当有序，从监管角度看如何理解有序的境界？它与相关法律界定关系如何？还是需要更为明确的可预期的界定。又如平台企业对其合法经营所得利润是否可以到某个法律没有禁止领域去投资，这方面涉及的有序的解释权应属于有关中央政府部门、地方政府、还是其它方面。这



些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厘清阐明，如果持续存在难以事先明确预期的模糊因素，可能会对经济运行和发展带来额外交易成本和不利影响。

总之，随着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对平台垄断企业适当加强管制和规范无疑是必要的，近来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也确实取得了多方面积极成效。在密集出台疾风骤雨般的政策举措解决一段时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之后，或有必要通过调整完善相关法律和制度，使得平台经济深化反垄断能够更充分体现法治经济法制社会要求，由此更有效地解决现实经济增长与“预期转弱”的矛盾，并更好地推动经济长期发展。

【来源：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CMF，作者：卢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英文杂志《China Economic Journal》主编】

[Top](#)

【进一步完善金融大数据管理的五个建议】

近些年来，与全球数字化大潮相适应，我国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迅速，在部分领域与先行者已呈并跑或领跑之势。中央明确将数据作为与传统要素并列的新生产要素，“十四五”规划纲要专门就建立健全数据要素市场规则作出部署。同时，由于数据具有不同于传统要素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等特点，现有的利益格局、管理体制、政策法规的不适应、不协调，数据的流通和利用面临着诸多难题和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应有的作用空间。建议进一步提高认识，理顺关系，采取得力措施，力争在不长的时间内推动数据要素的流通和利用取得大的进展。

第一，坚持用足用好活各类数据要素、加快发展我国数字经济的目标导向。既要重视数据产权保护不力、数据不安全等问题，也要防止有关利益主体借口数据产权和安全问题人为限制合理的数据流通的行为。强调数据产权保护和数据安全，是为了用好数据，本末不能倒置。我国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期，必须抓住用好这一机遇期，坚持“用”字当头，平衡和处理好数据产权保护、安全与利用的关系。这一条要作为各级政府发展数字经济的基本方针加以明确和坚持。

第二，在数据产权保护和安全上守住底线、放活渠道。由于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的特性，在有些规律还看不大清楚，法律体系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可在大量实践中看得准、有共识的领域，重点是在个人和机构隐私、国家安全等方面，列出不能流通或交易的负面清单，守住数据产权保护和数据安全的底线。同时要科学地界定数据的初始产权与增值产权，平等保护数据流通不同环节各类产权的合理权益。

第三，打破行政机构和平台企业对数据的不当垄断。政府在推动数据流通上要起带头作用。政府部门之间、政府对社会的数字阻隔依然是当前数据流通中的突出问题。可借鉴部分城市的经验，设立大数据局，统筹协调政府部门数据的权属、安全和流通，加快解决政务数据部门化、部门数据利益化的问题，把大量长期沉睡的政务数据解放出来，实现其应有的社会价值。对企业投入资源收集加工挖掘的数据增值权益要依法确认和保护，同时要防范和纠正某些平台企业利用市场垄断地位限制具有公共属性数据流通的行为，打击数据流通中的不正当竞争行



为，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分享数据的权利和机会平等。

第四，注重运用隐私计算等新技术助推数据流通。隐私计算是指在保护数据本身不对外泄露的前提下实现数据分析计算的技术，具有“数据可用不可见”“数据与信息适度分离”的特点，是平衡数据安全和利用很有潜力的新途径。近年来这类技术发展很快，在部分领域已得到应用。政府机构应带头使用这类技术，取得经验后再向更多领域推广。通过扩大需求，加上必要的政策支持，带动相关技术创新和企业发展。

第五，鼓励地方积极试验探索有效管理模式。数字经济总体上说仍处在发展初期，在顶层设计指方向、划底线的基础上，对数据流通和利用的市场组织形式、监管模式与法律制度，要留出较大的试错演化空间。目前已有部分城市设立了大数据交易所等机构，应鼓励多种技术结构和运营模式的竞争，既要开展场内交易，也要允许符合市场交易规则的场外交易。对数据流动的管理监管不宜“一刀切”，可在若干城市进行试点，允许不同模式的探索和比较，通过持续积累经验、总结提升，逐步形成稳定的全国性数据治理架构。

【作者：刘世锦，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Top](#)

人物关注

毫无疑问，人是社会经济环境中最活跃的因素。那么，哪些人的思想在影响中央高层的决策？哪些人会特别受到中央高层的关注？这些人的性格特征、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思想倾向是什么？这些特征如何影响事态发展？他们怎样影响中央高层、怎样影响周边环境？“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巨大的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物分析将有助于揭开复杂事物的真相，从而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

【李荣灿任湖北省委副书记】

李荣灿任湖北省委副书记

据《湖北日报》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批准：李荣灿同志任湖北省委副书记。1966年9月生，曾任商务部部长助理等职，2012年调甘肃省，历任甘肃省副省长，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甘肃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职务，2021年出任湖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据《湖北日报》）

张起翔任哈尔滨市政府党组书记 孙喆不再担任

据《哈尔滨日报》报道，3月3日上午，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张起翔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上述报道显示，张起翔已任哈尔滨市政府党组



书记，孙喆不再担任市政府党组书记职务。今年3月1日，中共哈尔滨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会议选举张安顺为市委书记，张起翔、代守仑为市委副书记，孙喆不再担任市委副书记职务。（据《哈尔滨日报》）

宋依佳任重庆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经中共中央批准，宋依佳同志(女)任中共重庆市委委员、常委和市纪委书记。宋依佳，女，汉族，1963年12月出生，上海人，199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8月参加工作，上海财经大学会计系会计学专业，经济学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宋依佳曾任职上海市政府，2018年11月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审计署纪检监察组组长、审计署党组成员，至此番履新。（据《重庆日报》）

[Top](#)

智囊高参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在中南海内外，活跃着一个特殊的幕僚群体，他们为中央高层出谋划策，并有意无意地向外界释放思想、建议、政策措施等相关信息。关注他们的观点、建议和动向，就好像“更上一层楼”，可“穷千里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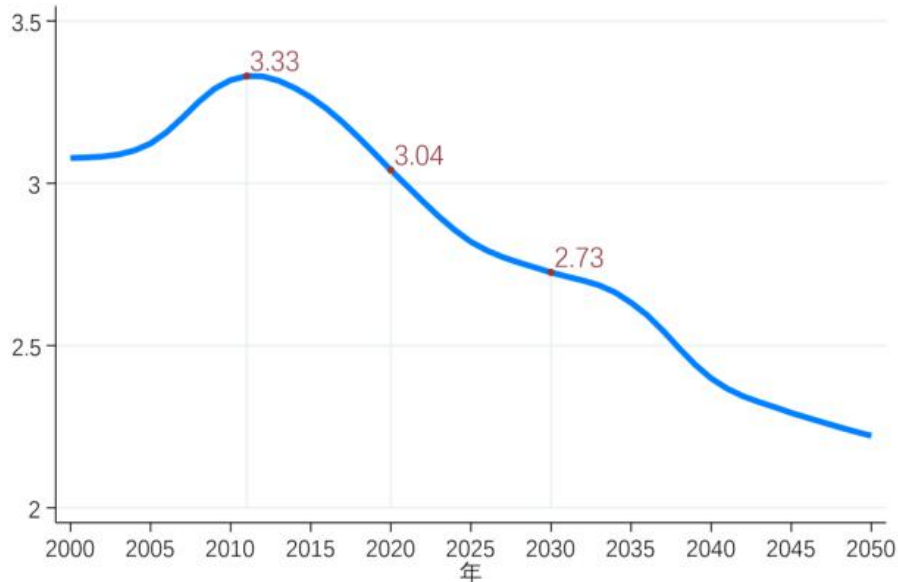
【王格玮、赵耀辉：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2000年，我国新生人口1771万，2001年降到1702万，之后一直在1600万上下徘徊。由于担心生育率过低，2013年国家出台了“单独二孩”政策，2014年新生人口增加了30多万，2015年又降下来。当年，国家出台了“全面二孩”政策，2016年新生人口增加了130万，达到1786万，可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2017年开启了人口断崖式下跌的走势，2020年新生人口滑落到1200万（见图1）。如果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中国人口负增长会提前到来。2021年，国家出台了“三孩”政策，并且承诺将来会配套一系列支持生育的措施，表明了政府高度重视人口结构方面出现的问题，并且决心以积极的态度去实现人口均衡发展。

图1 中国生育政策与年生育人数（2000年~2020年）



图 2 中国 20—49 岁育龄妇女人数 (单位: 亿)



我国未来人口生育面临的一个不利因素，是中国育龄妇女的人数现在已达到高峰（见图 2），未来会持续快速下跌。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9 修订版）》预测，中国 20—49 岁育龄妇女将从 2020 年的 3.04 亿下降到 2030 年的 2.73 亿，降幅 10.2%。此外，与中国周边的东亚国家和中国的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相比，他们没有限制人口生育甚至鼓励生育，然而情况也不乐观。日本 2020 年的生育率为 1.36，韩国仅为 0.84。几个汉族为主的地区，生育率也都比较低，中国澳门为 1.24，中国台湾为 1.18，中国香港的生育率在 2020 年降到 0.87，创下了历史最低水平。“七普”报告显示，中国大陆人口出生率已经降到 1.26，与上述国家或者地区相比，尚处于较高水平。如果这些国家（地区）的低生育水平表明东亚文化有抑制生育的因素，那么我国人口生育的前景可能十分不乐观。因此，判断未来人口发展趋势或生育支持政策是否可以奏效，需要对影响生育的因素进行全面的分析。

■女性的机会成本是最大的生育成本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生育本质上是一个家庭的决策，是基于现实条件和约束的优化结果，取决于生孩子的成本和收益。生孩子的收益是什么？在传统社会里，传宗接代是生育（尤其是生育儿子）的重要考虑，除此之外，子女很重要的一个



功能是养老，也就是在父母到了老年、没有办法去挣钱或者需要照料时，孩子可以提供经济供养与照料支持。同时，孩子也是一种消费品，可以直接带来效用提升。另外，孩子也是维系婚姻关系的纽带。

生孩子的成本是什么？首当其冲的是女性在孕育孩子过程中会经历一些精神和身体方面的痛苦，也面临健康风险；其次，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家庭会发生包括住房、教育等费用；再次是女性在怀孕、生育和养育孩子的过程中，要放弃一部分工作收入、牺牲工作时间，给职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生孩子的收益越高，人们越愿意生养子女；生孩子的成本越高，人们越不愿意生。总体而言，养老社会化和伴随女性教育机会增加而发生的女性机会成本上升，是在世界范围内生育率普遍下降的根本原因。这些变化首先发生在发达国家，再逐步蔓延到发展中国家。我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生育率大幅度下降，虽然与计划生育政策有关，但是大趋势和全世界并无二致。

从我国生育率下降的宏观和社会因素来看，生育孩子的收益下降，而成本上升，两方面的原因都有。对于收益的变化来说，首先，传统的家庭养老正在转为社会化养老。由于养老保险制度的全面推行，结合高龄老人补贴等福利政策，政府越来越多地接管了赡养老人的功能。同时，政府通过建设养老院、推广社区养老，以及试点推行长期护理保险，也在逐渐接管家庭照护老人的功能。其次，由于家庭冲突乃至离婚率的上升，年轻人从婚姻当中获得的满足感下降，婚姻生活的收益下降影响了生育率；第三，孩子带来的“效用”也在降低，“宠物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养育孩子的快乐。

■生育成本主要包括教育成本、住房成本还有女性的机会成本等。

第一，教育成本。中国大多数地方长期缺乏优质的教育资源，数量众多的孩子竞争为数不多的小学、中学优质学位，优质大学数量少，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都导致父母在子女教育方面太过焦虑，不仅投入了很多钱进行各种补习，同时搭进大量时间和精力，甚至带来亲子冲突和夫妻冲突。近期实行的“双减”政策，其目标就是为了消除家庭教育投资方面的过度竞争，但是这些措施治标不治本，很可能导致竞争以其他方式继续。教育过程的这种焦虑感降低了育儿的幸福感。

从长期影响来看，儿童在在充满竞争和焦虑的环境中长大，缺少快乐，精神健康可能受损，他们成年后难以发展亲密关系，恐婚、恐育现象难免增多。现在大学生群体的精神健康状况非常令人担忧，跟儿童时代的成长环境不无关系。

第二，住房成本。孩子属于经济学范畴的空间密集型消费品，养育孩子至少需要添置卧室，如果房价太高，父母就没有办法提供更大的空间。国际上房价较低的地方，生育率往往较高。在我国的大城市，房价收入比非常高。2020年我国大城市[2]房价与收入之比达到13.4，最高的五位城市深圳、三亚、上海、北京和厦门，房价收入比均大于20倍，分别为39.8、27.1、26.2、23.8和23.1。如果房价收入比达到了20倍，再假设年轻人的收入达到平均社会水平的两倍，并且他们可以每月存下一半的工资来承担房子的成本，那么两个孩子的四口之家如果要购买住房，需要双职工至少40年的工作收入。

第三，女性机会成本。在所有生育成本各类项目中，公认最重要的项目是女性的机会成本。相较于男性，女性往往要为生养子女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导致她们的收入、工作机会和职业发展等会受到影响。这个负担是所有成本项目里最大的一项，也是各个国家鼓励生育政策的最主要落脚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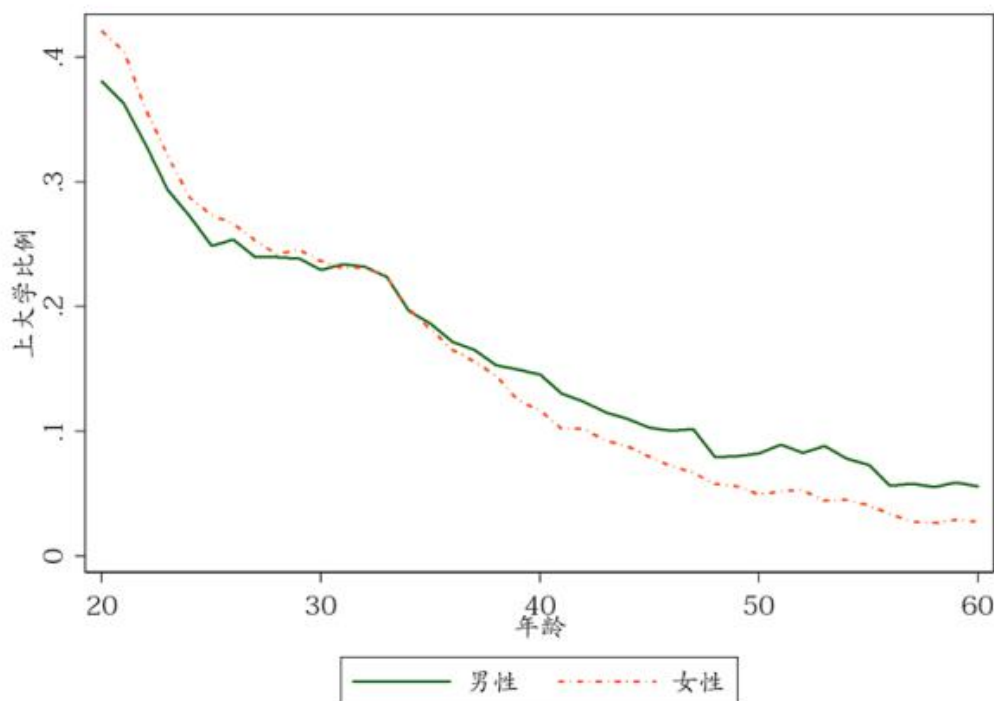
传统社会中，女性缺少正规就业机会，因此生养孩子机会成本不高，但是随



随着女性受教育年限增加，尤其是女性就业率的上升，机会成本变得越来越重要。在西方发达国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女性就业有了巨大进步，最近仍然在不断上升。目前，大部分 OECD 国家 25—54 的女性，就业率超过了 60%，北欧国家甚至超过 70%。女性与男性工资的比例也一直在缩小。以美国为例，女性的周工资最近已经达到男性的 80% 以上。

新中国女性就业率一直高于发达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女性的就业率略有下降，但是仍然很高，2010 年人口普查显示，25—49 岁人群中，男性的就业率为 94.2%，女性为 80.5%。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就业率尤其高，比未能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高出将近 20 个百分点。同时，女性的教育程度相比于男性有了很大的进步，从 1982 年左右的出生组开始，女性上大学的比例甚至超过男性（见图 3）。这说明，就业对于中国女性很重要，她们有就业的意愿和能力，如果因为生育而放弃工作，就会发生机会成本。

图 3 中国不同年龄和性别人群高等教育水平



在很多发达国家，经过几十年性别平权的努力，就业市场上的性别歧视已经很少，而且各国对女性就业有很多支持政策。即便如此，虽然男女工资差别已经缩小，但是仍然无法消除。对此现象的解释，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由于女性负担了生育的功能，而生育使女性遭受“生育惩罚”。

■ 女性“生育惩罚”的现实

生育惩罚，简单地说就是女性生完孩子以后不得不退出劳动力市场，即便能够回去，获得的工资收入也受到损失。这种损失往往是女性因为长时间离开劳动力市场而损失了技能提升的机会，或者因为家庭负担使其无法胜任高强度、高工资的工作而转到低工资的行业和职业。经济学家对生育惩罚进行了测算。以丹麦为例，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前，夫妻的收入变化轨迹基本是一致的，但是孩子出生之后，父亲的收入没有变化，而女性之后的收入会下降。即使到了孩子出生的 20 年后，母亲的工资比父亲仍然低 21%，这个差距的来源一方面女性劳动参



与率下降了 13.4 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是即使对于成功回到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其工作小时少了 6.5%，小时工资低了 14.3%[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毕如岱的博士论文研究发现，用中国的相应数据来测算，女性在生完孩子以后收入和劳动参与率也出现了非常大的下降。

■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政策选择

生育是家庭的重要功能，同时起到维护社会和谐的作用。一个人如果没有子女，或者子女个数过少，老年期将面临很大的经济和照料风险。同时，对于子女来说，如果没有兄弟姐妹分担照料父母的负担，个人压力很大。从国家的角度看，一个民族的生育水平，不仅影响经济发展，还会影响该民族在国际上的地位。

我国家庭虽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我们没有必要过于悲观。诚然，孩子的“使用价值”在降低，但喜欢孩子毕竟是人类不会泯灭的天性。同时，在老年照料方面，虽然有各种社会化养老服务，但是孩子的作用仍然非常重要。即使在发达国家，老人在失能之后，住进养老院的仍然占少数，孩子依旧是照料的主体。这就给予了我们鼓励生育的政策空间。在教育方面，首要的前提是加强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一方面，要增大教育投资，提升教师的工资，吸引高水平的人才加入教师队伍，以达到普遍提升教育质量的目的。另一方面，需要放宽对私立教育的限制，当高收入人群愿意付费接受私立教育时，公立教育资源就可以腾出来，更密集地投入到余下的学生中。在大学教育资源的配置方面，要着力于改善校际和地区间经费的差距，缩小大学之间的质量差别。

在住房方面，要让年轻家庭买得起住房。适当放开城市土地供应，才能起到遏制房价快速上涨的作用。在鼓励生育方面，最重要的还是女性及生育友好型的政策。在今天的社会，女性早已脱离了被当作生育机器的命运，生育不是丈夫一个人说了算，更不是行政命令能够左右的，而取决于家庭，尤其是女性个人的选择。要提高生育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只有足够尊重并且保障女性的就业权，只有足够重视并且支持女性的事业追求，只有对女性的付出进行足够的补偿，才能够获得生育率的提高。

基于保护女性就业的考虑，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鼓励生育的政策都是围绕着减轻女性的生育负担展开，这些政策主要分两类，一类是延长产假，尤其是带薪产假；一类是提供育儿支持，如托儿所、幼儿园服务。研究发现，适当长度的产假对于提高母亲就业、缩短两性工资差距有益，但是过长的产假反而有害，尤其是对于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更加不利，并未能消除女性的生育惩罚。比如在丹麦这样的福利国家产假很长，这虽然能够保护女性的就业岗位，但离开就业岗位时间太长反而会增大女性返回职场的难度。同时，研究发现，产假延长等政策对提高生育率的效果微乎其微，因为女性更在意事业前景，不愿意休太长的产假。近来，多地出台了延长产假和生育假的政策，增幅较大的有河南省和海南省实行了 3 个月的生育假，使女性在生育后的休假总天数达到 190 天。还有省份按照胎数逐级递增，如浙江省规定 2 孩和 3 孩可以多休 30 天。不过，产假的双刃剑效果值得注意，因为离开工作岗位时间过长，反而对女性的职业发展不利。目前我国在产假方面，最重要的关注点应该是拓宽产假覆盖的范围。目前大量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并不提供任何产假待遇。

降低生育惩罚的关键是优质廉价托育服务。在所有研究文献中，幼儿托育服务都被证明可以有效提高生育率，其原因在于，托育服务可以帮助女性留在就业市场，平衡事业和家庭，从而降低生育的机会成本。在缺乏托育服务的情形下，高收入家庭可以通过请保姆或者由祖父母照料孩子的方法，返回职场；而低收入



的家庭请不起保姆，父母也通常无法放弃挣钱的工作而专门提供照料，因此对于他们平衡工作和家庭最困难，很多人不得不把孩子寄养到老家，成为留守儿童。所以对低收入家庭而言，社会托育服务的价值更大。

我们认为，在女性重视事业发展的时代，鼓励生育的政策应该着力于帮助女性尽快回到就业市场。其中，最重要的配套政策，应是托幼服务。我国在0—3岁幼儿的托育服务方面十分欠缺，2岁以下的托育服务更是少之又少。即便存在这样的服务，由于供给严重落后于需求，因此收费极高，工薪阶层无法承受。近年来，政府提出大力推动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但是进展很慢，存在很多制度障碍，尤其是准入标准过高的问题突出。我们建议要鼓励和支持民办小型或者家庭托育机构，降低准入标准，同时加强质量监督，以促进托育行业快速健康成长。

最后，东亚地区的传统文化一定要与时俱进。东亚整体的生育率非常低，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东亚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相比全世界仍偏低。男性往往不干家务，女性既要养孩子又要忙事业，过于辛苦，因此就会“罢工”，通过不生或者少生来表达她们的抗议。中国要提高生育率，一定要倡导男女平等，尤其是鼓励男性承担家务责任，本着性别平等的原则分摊养育成本，获得共同的福利改进。这样还可以改善夫妻关系，增长孩子与父母双方共处的时间，有益于孩子的身心发展，真正做到多子多福。

家庭、生育、女性和儿童的利益跟全社会的利益是一致的。只要我国政府和民众足够重视，采取切实的措施，把我国生育和养育负担实质性地降低，生育惩罚降低到最小程度，就可以收获一个美好和谐、生机勃勃的社会。

【来源：《复旦金融评论》，作者：王格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副研究员；赵耀辉，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Top](#)

【姚洋：GDP目标增长5.5%左右 优势在财政和货币政策】

3月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总理在报告中表示，2021年中国经济保持恢复发展。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4万亿元，增长8.1%。全国财政收入突破20万亿元，增长10.7%。城镇新增就业1269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1%。居民消费价格上涨0.9%。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对于2022年的经济增长，《政府工作报告》透露，今年经济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全年控制在5.5%以内；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解读《政府工作报告》，认为实现GDP5.5%左右的增长目标，优势还是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需要在消费端多想办法。

■5.5%的增长是一个可以理解的指标

《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设定了5.5%左右的目标值，有些出乎市场的意料，之前很多人预期会给一个区间，比如5%-5.5%。但是，政府工作报告直接设定了5.5%左右，我想更大的原因是给大家鼓劲。但是，设在5.5也不是一个非常高的目标。我做过比较简单的计算，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仍然是5.5%-6%之间。设在5.5%我觉得也是一个可以理解的指标。从2020年开始，这两年中国的平均增长率还没达到5.5%，也就是没有达到我们的潜在增长



率。今年把目标设定在 5.5%，接近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也许也是一个考虑。

实现这个增长目标，我们优势还是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当前中国财政政策的力度是非常大的，有 3.65 万亿元规模的地方债。地方政府也制定了 30 万亿的投资方案，虽然这些可能需要很多年来实施，但是今年的投资额肯定会超过 3.65 万亿。这会收到比较大的效果。在货币政策方面，兼容性比较强，也比较宽松一些。在消费端会有阻力，如果消费端不能跟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起来，要实现 5.5% 这个目标还是有些难度的。

消费端可能的好消息，或者说我们期待的一个好消息，是到年中的时候疫情管控方面可能会有所调整。在过去这一年多时间里，我们积累了很多的防疫抗疫经验，现在完全可以做到精准防疫，发现一例马上完成流调，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可以做得非常精准。如果到今年年中的时候，在能够实现精准防疫的基础上，放开国内旅行，甚至在某些城市也可以适当地开放国际旅行，会对消费的增长非常有帮助。2021 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和防疫力度加大就有非常大的关系。影响消费的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是居民收入状况，如果看数据，去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已经达到了 GDP 的增长速度。所以，也不见得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跟不上经济增长的速度。另一方面，由于疫情之后居民的储蓄是增加的，说明很多人看到未来的一些不确定性，有意减少了消费，增加了储蓄。一旦他们看到了经济向好的趋势，大家的消费就会增长起来。整个社会信心提升会有助于消费的提升。

■ 还是应该多在消费端想办法

当经济增长没有达到潜在增长率的时候，国家一旦要刺激经济，无外乎一个是财政政策，一个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今年加码，货币政策还是比较宽松的，其实已经在做了。当然财政政策有一个投向的问题，是更多地投到投资端，还是更多地投到消费端，这是可以选择的。现在看来，我们还是比较习惯于投到投资端而不是消费端。

从《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看，财政政策方面的力度比较大，给地方政府 3.65 万亿的地方债的额度，是很大的力度了。另一方面，对消费的强调还是不太够，措施没有财政政策那么到位，只是提了一些鼓励某些行业比如汽车等领域的消费。如何去鼓励消费，我想这仍然是政府宏观政策里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这两年以来我们在消费方面拿出的措施，远远没有供给方面和投资方面那么多。

我觉得还是应该多在消费端想办法。现在看好多地方已经把房地产放开了，把首付降到了 20%，这是个比较低的比例。现在总是出现时紧时松的状态。去年下半年，把房地产行业管起来，今年又放开，如果总是放收放收，就不是一种管理经济的好的办法。宏观经济学最基本的一条是，当经济增长速度没有达到潜在增长率的时候，凯恩斯经济学就是管用的。凯恩斯一再强调，投资依赖于预期，预期不好大家就不会投资。也就是说投资是内生的，消费当然也有一部分是内生的，但是，消费还有很大一部分事实上凯恩斯说是自主性的消费，你给我多的钱，我就会多消费一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把自主性的消费给调动起来。经济是个闭环，一年生产的最后要么投资了，要么消费了。投资又取决于未来的生产，它是内生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自主消费这块拉起来，这块拉起来了，生产就跟着涨，短期里面宏观经济学就是这么运作的。一百多年来，这是一个被实践检验正确的理论。消费不上去，生产就上不去，要关注供给端，短期来说它是一个闭环，这是恒等式。当然还可以考虑进出口，但是进出口占的比例实在是太小了，进出口占 GDP 的比例不到 2%，最重要的还得靠消费和投资。



以前，我们说投资还有政府投资，但现在地方政府投资的意愿也降低了，这两年很多地方政府投资额度都没有用完。有两个原因。一是好项目不多了，地方政府越来越理性了，不想乱投。第二，经过 2018 年去杠杆，要求地方政府降杠杆，他们也不想多负债。所以，地方政府投资的拉动作用也在下降，积极性不高了。这跟地方政府的债务有很大的关系。比如，城投债这一部分，从银行借的钱，规模很大。有数据显示，去年从市场上筹来的市政债增加了 5.7 万亿元，但是，很大一部分是借新还旧，实际融来的新的融资不多，很多地方是借新钱去还旧钱，快到无法运转的地步了。在这种情况下，让地方政府再去借债，他不愿意借啊。现实中出现这样的矛盾：中央政府一直在说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要求地方政府不能再借债了，但是另一方面，又说再给你些地方国债，拿上钱让这些钱再去投资。而且，一般来说地方债这点钱不够地方政府花，它还需要到市场上去筹钱。在这种情况下，它投资的积极性就更低了。

这几年反复讨论地方债务的隐性风险，增加大规模的地方政府债务和控风险的目标存在着矛盾。老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在说要保增长，就要求地方政府去投资，过两年一看地方债务这么大，还款周期来了，怎么办？就要控债务。这样不行，还是要有一个想法。首先，不能老用政府投资、基建投资作为唯一的刺激经济的手段。现在看来，似乎又有点回到了基建投资。尽管我们好多时候都在说这个，“铁公基”不好，关键时刻，又经常只能把这个拿出来。但是，基建的的确确它的效用是在下降的。地方政府更明白这一点。要慢慢转变观念，得搞消费，难度非常大。但观念不转变更没办法。

另一方面，中央核发的地方债规模可以增加一些，应该让地方政府用地方债把活全给干了，不要让他们拿上地方债，这个工程就变成一个“钓鱼工程”，他到市场上去举债，欠一屁股商业性债务。商业性债务是很麻烦的，因为周期短，所以它需要不停地借新还旧，扰乱金融秩序。地方债有个好处，期限长，用政府税收来还，地方政府用起来也会比较谨慎小心。

■炒房一夜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

去年下半年，我们觉得经济过热，特别是房地产过热，调控手段比较猛。一下把房地产给压下来了。房地产是个链条非常长的产业，一旦房地产下来，好多产业都跟着下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房地产的定位没有变化，还是“房住不炒”，所以总的而言，房地产未来不会是一个保值增值的手段。

中心城市房价不太可能掉下来，但是增长空间比较小了，不是说没有增长空间，肯定有，但是如果算复合增长率未必比投资其他资产要高。而且房地产的流动性很差，有好多地方的房，挂在市场上一年半载都卖不出去，因为它的价格太高了，哪有那么多人有那么多的资金买这样的房子。如果你握着这样的资产，急需用钱的时候脱不了手，最后赶紧打个折变现，会发现实际上没赚到钱。它不像金融资产说卖就卖掉了。

过去这 20 多年间，房价增长速度太快，房地产对很多人来说成为保值增值的手段，但是在发达国家很少有人把房地产作为保值增值的手段，因为它涨得已经快见顶了。你也不能说它不涨，纽约、伦敦那些地方还在涨，但是很少有人把房产作为一个金融资产的主要储值手段。年轻人应该转变思路。其实中国特别是在一线城市，很多人收入水平都超过 25000 美元了，还把房子看作一个主要的储存资产的手段，恐怕是不太理性的做法。通过炒房一夜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人民币不会剧烈贬值

美联储加息，中国没有跟着动，没有跟着它也加息，这是对的。我们的货币



政策比较宽松一些是正确举措。当然，它会对人民币有一些贬值的压力。但是，如果在经济增长方面，基本面方面做得更好一些，贬值的压力也不一定会有想象的那么大。人民币稍微贬点值，说不定对中国的出口还有好处。

我不认为人民币会出现剧烈地贬值，贬到 6.8、6.9 不太可能。如果要贬值的话，顶多到 6.5 左右，不用太担心。而且，老百姓、企业对人民币汇率贬值、升值的承受能力比以前强多了。在通胀方面，去年大宗商品价格猛涨，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才涨了 0.9%。今年报告定在 3% 的通胀率，我们的通胀率已经连年低于“两会”定的数据了。今年如果能达到 3%，那说明我们的经济真的复苏了，需求回来了，消费回来了。所以一些人说滞胀，根本不存在，中国绝不会有滞胀。有人可能说 PPI 比较高，这主要还是原材料价格上涨推动，但是，它最后没有反应到老百姓的需求消费品上。一些生产企业承压，但老百姓得利了。今年两会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保护中小企业的措施。譬如今年税费支持政策增长到了 2.5 万亿，去年是 1 万亿元的规模，增幅非常大。这说明中央对于保市场主体的用力非常猛，很明显地是要保护中小企业，因为大企业事实上对于这点税收减免是不敏感的。别看 2.5 万亿是很大的数，分散到近千万各级别的市场主体上面并没有多少，主要受益的还是中小企业。它们是吸纳就业的主体，保市场主体也就是保就业。

【来源：新浪意见领袖，作者：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Top](#)

虎视寰球

全球化加剧外部冲击的力度，既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同时又使全球经济的发展更加不平衡，并导致各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和社会等等全方位的矛盾和冲突。如何面对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化弊为利？从决策的角度，不仅中央高层在殚精竭虑，那些有志于在全球化中冲破重围的企业家和改革家更是殚精竭力。那么，双方如何互动？本栏目力求更多的向大家提供有价值的建议和启发。

【伊核会谈暂停 达成协议希望犹存】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 3 月 11 日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在维也纳举行的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会谈暂停。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会谈再次暂停，但美国和伊朗仍有较强动力恢复履约，各方对达成协议也都有积极表态，这为谈判最终成功留下了希望。但鉴于相关方仍有分歧未解决，会谈能否快速重启难以预测。

■ “外部因素”引猜测

博雷利 11 日发推文称，有关美伊恢复履行伊核协议的最终文本已基本准备



好，但由于“外部因素”，维也纳会谈需要暂停。他表示将继续与伊核协议参与方及美国保持联系，以克服当前困难，最终达成协议。一些西方媒体将“外部因素”与俄罗斯政府近日所提要求联系起来。俄外长拉夫罗夫5日说，西方就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对俄施加的制裁已成为伊核会谈达成协议的“绊脚石”，俄方希望与伊朗的贸易、投资和军事技术合作不因制裁受阻，要求美方就此作出书面保证。但美国拒绝了这一要求，国务卿布林肯6日说，对俄制裁与伊核谈判是“两码事”，两者“不相干”。有西方舆论据此指责俄方阻碍谈判。

对此，维也纳会谈俄罗斯谈判代表乌里扬诺夫11日反驳说，俄方支持早日达成协议并为此竭尽了全力，但能否达成协议并不仅仅取决于俄罗斯。有其他方需要更多时间讨论悬而未决的问题，企图把会谈延长归咎于俄方是“肮脏的游戏”。另有分析认为，会谈可能与美国对伊朗提出的新要求有关。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10日在与博雷利通电话时说：“美国提出的一些新要求毫无道理，与其希望迅速达成协议的立场不符。”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沙姆哈尼10日也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美国缺乏“政治决断”，使谈判“变得越来越复杂”。不过，伊方没有说明美方提出了何种新要求。

■重申意愿留希望

尽管关于会谈暂停的原因并不明确，但美伊双方均表达了希望完成谈判的意愿，这让人们感到达成协议的希望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卜扎德3月11日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会谈暂停可为解决剩余问题提供动力，会谈的圆满结束将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任何外部因素都不会影响向达成协议迈进的共同意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3月11日也说，美国仍然相信恢复履约的潜在协议已经接近完成。在维也纳具体负责协调伊核会谈的欧盟对外行动署副秘书长莫拉也说，所有代表团在谈判中都展现出了妥协精神，伊朗和美国都在谈判中采取了非常有建设性的积极态度，他希望谈判能很快重启。分析人士指出，美伊双方都有达成协议的动力，美国希望加速从中东地区抽身，伊朗则希望解除制裁为经济发展松绑，而当前能源价格上涨或将进一步加强双方达成协议的意愿。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伊朗问题专家刘岚雨说，美国希望包括伊朗在内的产油国增加石油供应从而稳定油价，伊朗则想借助当前形势迅速回归国际原油市场。

■能否突破待观察

尽管各方此前一段时间都暗示会谈已进入最后阶段，此次会谈暂停时也重申了希望达成协议的意愿，但鉴于会谈曾在2021年6月第六轮谈判结束后因伊朗政府换届等因素中断长达5个月之久，此次会暂停多长时间还是未知数。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国家在表达达成协议意愿的同时，也不乏带有推责甚至威胁意味的表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11日说，谈判还剩极少数棘手问题悬而未决，“一些决定需要在德黑兰和莫斯科做出”，如果伊朗和俄罗斯有此意愿，美方相信不久后就能达成协议。英国和法国谈判代表则表示，影响会谈的“外部因素”问题必须在今后几天内解决，否则会谈可能破裂。

美国和英法德近几个月频频以伊朗快速推进核项目为由，给伊朗下达“最后通牒”，威胁称如短期内达不成协议会谈就将破裂。但在会谈屡次突破所谓“最后时限”后，美欧并未退出谈判。此次的“最后通牒”到底是美欧再次采取的极限施压策略还是“狼真的来了”，仍有待观察。美国智库欧亚集团分析师亨利·罗梅说，鉴于美国和伊朗在恢复履约上意愿趋同，恢复履约仍有“一条明确的道路”，但这需要各方发挥“一定程度的创造力和灵活性”。他表示，会谈暂停时间越长，谈判就越有可能进入一种既无法达成协议又不破裂的僵局。不过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东研究所教授范鸿达认为，会谈中出现的新变化对谈判进程可能造成一些延迟，但不会对达成协议的前景带来根本性影响。（据《光明日报》）

[Top](#)

【尹锡悦当选 韩国内政外交走向何方】

经激烈角逐，韩国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前检察总长尹锡悦以领先 0.73 个百分点（约 25 万张选票）的微弱优势，险胜执政的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韩国第 20 届总统选举终于落下帷幕。在韩国历届总统选举中，本届总统选举选情最为胶着，过程最富戏剧性。投票结束后，韩国 KBS、MBC、SBS 三家媒体的联合出口调查显示尹锡悦领先李在明 0.6 个百分点，而媒体 JTBC 的出口调查结果是李在明超出尹锡悦 0.7 个百分点。计票至 3 月 9 日投票日晚 12 点，李在明一直领跑；但到了 10 日凌晨，尹锡悦逐渐扭转颓势，最终转败为胜。

尹锡悦一直以来就职于检察机关，2021 年 3 月从检察总长位置上辞职，6 月 29 日正式宣布竞选总统。尹锡悦步入政界仅短短数月便登上总统宝座，主要是因为他抓住了韩国多数民众希望“政权交替”的历史机遇。作为“政治素人”，尹锡悦上台后韩国的内政外交将走向何方？

■三大首要任务

尹锡悦上台执政后，首先将面临加强国民团结、克服新冠肺炎疫情、促进经济增长这三大首要任务，同时他重视公平公正和法治正义。

首先，尹锡悦提出要成立“国民统合政府”，呼吁现执政的共同民主党今后能与国民力量党齐心协力治国理政。他表示，将超越阵营、地域、阶层差异，广泛吸收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对经济、社会层面的各种制度与文化进行革新，建设自由、创新、充满活力的国家。朴槿惠总统弹劾案和前法务部长曹国事件给韩国民意带来分裂，本届大选胶着状态反映出韩国国内的民意撕裂和左右势力尖锐对立。尹锡悦上台后将面临国会“朝小野大”的局面，要想顺利执政，必须先弥合矛盾，安抚民意，促进和解，整合各党派力量进行“共治”。

其次，针对不断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尹锡悦拟采取措施妥善管控并弥补损失。韩国新冠肺炎疫情每日新增确诊病例从数千、数万剧增至二三十万例，尹锡悦表示将尽快成立政权交接委员会，基于数据信息进行科学防疫，综合处理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防疫、保健、医疗问题，并大幅追加预算，对个体户、小工商业主给予补偿和紧急援助。

再次，经济从政府主导转向以私营为中心，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增加中产阶级数量，增加优质住宅供应，放宽住房贷款规定，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尹锡悦表示，要建设以科学技术为中心的国家，着力打造“电子平台政府”“创新政府”，扩建数字基础设施，促进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尖端技术和新兴产业发展。

最后，坚持法治、正义、公平、公正原则，加强检察独立性，严惩贪腐。尹锡悦竞选期间曾表示会清除积弊，废除法务部长官搜查指挥权，赋予检察总长独立编制预算的权力等。今后是否会付诸实施，以及能否在国会通过，需拭目以待。

■对外政策或诸多调整

韩国已成为 GDP 进入全球前十的国家，尹锡悦表示将让大韩民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相应作用，成为受人尊敬的“全球枢纽”国家。从尹锡悦团队的竞选发言看，其外交政策走向可能存在以下特点。

第一，视韩美同盟为韩外交政策的核心，有意拓展韩美同盟的内涵和外延，



构建韩美全面战略同盟。韩美同盟可能将不仅涵盖军事安全，还包括经济、高科技、供应链、信息安全、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多个领域，合作范围可能从应对半岛问题拓展到地区甚至全球层面。这是否意味着韩国可能参与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美日印澳“四国机制”，让人担忧。尹锡悦当选后即与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拜登表示期待美韩同盟超越安全、经济层面，扩大到更多领域合作，约定在尹锡悦就任后尽快与其见面。5月末拜登将访日，届时是否顺访韩国并举行美韩首脑会晤，令人关注。

第二，基于相互尊重原则继续发展韩中关系，推动韩中紧密经济合作。尹锡悦当选当天，中国驻韩国大使邢海明向他当面转交了习近平主席的贺电，尹锡悦表示相信韩中关系会继续得到发展。尹锡悦曾撰文表示，韩中关系建立在尊重彼此利益和政策立场的基础上，韩国要与中国建立更紧密合作关系，在求同存异基础上进行合作特别是经济合作，定期举行高级别战略对话。他认为，韩不应被迫在中美间做选择，要以不损害本国核心安全利益为原则。

第三，本着实用主义原则，弥合韩日矛盾，打造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尹锡悦有意重新改善韩日关系，通过首脑穿梭外交，加强年轻一代交往，重塑两国信任；通过成立高级别谈判小组，探讨解决在历史、贸易、安全合作等方面矛盾与分歧的方案。尹锡悦当选后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通电话，双方表示愿就改善双边关系进行合作。

第四，寻求恢复韩朝正常关系，推动半岛无核化。尹锡悦在竞选期间表示，韩朝对话大门随时敞开，将以朝鲜态度变化为前提，慎重推进对朝经济合作。如朝鲜对完全、可验证的无核化态度积极，采取实质性无核化措施，将全力给予朝鲜经济支持，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大规模投资对朝援助项目。如果朝鲜不改变态度，则发表终战宣言为时尚早。同时，针对朝鲜开发核导，韩国会加强韩美同盟，加强军备，加紧构建导弹防御体系。尹锡悦团队在竞选时表示，应根据朝鲜日益增长的导弹威胁，对额外部署“萨德”持开放态度。南北加强军备竞赛很可能加剧半岛和东北亚紧张局势，不利于半岛问题解决和东北亚长治久安，国际社会对此十分关注。（据《光明日报》）

[Top](#)

【面对乌克兰难民 欧盟这次不一样】

因俄乌冲突持续，连日来大量乌克兰难民涌入欧洲，引发各方关注。据多家媒体披露，截至3月6日已有超过150万名乌克兰难民涌入欧洲。接纳难民最多的国家是波兰，已接纳100万名难民，其次是罗马尼亚、摩尔多瓦、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乌克兰邻国，接纳难民数量达十几万到二十多万不等。德国、捷克、奥地利等国也分别安置了数万名难民。分析人士指出，这将是二战以来欧洲规模最大的一次难民潮，欧洲正面临着2015年难民潮后另一场大规模难民危机的考验。

■ 欧盟对乌克兰难民敞开怀抱

3月3日，欧盟成员国就如何接纳难民达成共识，将通过“临时保护指示”计划为乌克兰难民提供临时保护。根据这项计划，欧盟允许乌克兰难民在任意一个欧盟成员国申请临时保护身份，申请成功者将取得临时居留证，并获得就业、医疗、教育等权利及其他社会福利。难民临时保护身份有效期限为一年，后续政策视情况由欧盟成员国共同决定，最多可再延长两年。这项“临时保护指示”原本是为应对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解体引发的难民潮而制定的，并于2001年



通过，然而，此后该计划从未真正实施过。欧盟此番重新激活该计划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普·格兰迪表示欢迎，称其“史无前例”。欧盟内政事务专员伊尔瓦·约翰森表示，这是一项“历史性”的临时保护协议，但他同时也提醒欧盟“不应该天真”，“乌克兰的百万难民势必会对我们的社会带来挑战”。

即便如此，乌克兰及欧盟国家在应对本次难民潮的起初阶段仍然受到了涉嫌种族歧视的批评。来自数十个国家的第三国公民，包括来自非洲、印度、巴基斯坦及中东国家的移民工人和留学生等，在试图离开乌克兰进入欧盟时遭遇了区别对待。部分第三国公民对媒体称，他们被拒绝进入乌克兰境内的防空洞，边防人员阻止他们越过边境，或者把他们推到队伍的后面，许多人被迫在寒冷的天气中长时间等待。对此，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安东尼奥·维托里诺发表声明，对有关试图逃离乌克兰的第三国国民遭受歧视、暴力和仇外心理的报道感到震惊，呼吁各国调查这一问题并立即加以解决。多位联合国人权专家也对逃离乌克兰的非白人面临的种族主义威胁和仇外待遇表示严重关切。为此，欧盟国家及时调整政策，多个国家宣布将不分国籍接收乌克兰难民。

■对待乌克兰和中东难民呈现不同景象

有媒体分析称，本次难民潮与近年来叙利亚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引发的难民危机有着诸多不同之处。首先，乌克兰与欧盟国家陆地接壤，经济、社会等方面联系紧密，很多乌克兰难民都有亲戚或朋友在欧盟境内生活，因此大部分难民目前只是临时前往欧盟境内投靠亲友躲避战火，预计俄乌冲突结束后还会返回乌克兰。而来自中东地区的难民则多以移民欧洲为目标，大多会申请欧盟的政治庇护，对政府救助的依赖很大，还面临社会融入等诸多后续问题，成员国安置起来十分烦琐。其次，对于欧洲人来说情感上更容易接受乌克兰难民。波兰华沙大学偏见研究中心 2021 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超过 90% 的受访者愿意接受乌克兰人作为同事和邻居。乌克兰人被他们称作“斯拉夫兄弟”，历史上的共同经历让他们在情感上更为亲密。面对当前的乌克兰局势，东欧国家的共同历史记忆被唤醒，这也正是当前欧洲各国空前团结的重要原因之一。相比之下，来自中东的穆斯林难民与欧洲人有着巨大的文化差异，而且欧洲人也担忧极端思想的传播会给欧洲带来恐怖主义威胁。

上述原因导致了欧盟及其成员国在对待乌克兰和中东难民时呈现出不同的景象：2021 年，当来自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难民试图跨越白俄罗斯边境的森林进入波兰时，波兰在边界上修建了铁丝网和栅栏。波兰国防部长布瓦什恰克称，对中东难民的开放政策导致了西欧的恐怖袭击，波兰内政部长卡明斯基更是将这些难民称为“游客”或“潜在的恐怖分子”。

而在本次难民潮中，欧盟国家展现出了团结一致的姿态。波兰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设置了 30 多个安置中心，并简化了边境检查手续，仅 3 月 5 日一天就帮助近 13 万名乌克兰难民顺利入境。波兰人开着私家车前往边境，举着写有他们居住城市的牌子主动迎接难民。在波兰东南部城市普热梅希尔，该市市长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的第三天就请民众不要再运送救援物资，因为收到的物品已经多到放不下。波兰总统杜达还将两处总统官邸腾出来作为难民安置点。在波兰等与乌克兰接壤的欧盟国家，入境的乌克兰难民如果没有可以投靠的朋友或亲戚，可以留在安置中心并能得到食物和医疗服务。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正在向难民发放食品、衣物和现金津贴，当地学校也为难民儿童分配入学名额。捷克已启动应对难民潮的计划，简化难民申请特殊类型签证的程序。距离乌克兰更远的德国、奥地利同样实施了相应的计划迎接乌克兰难民。



■ 欧盟统一难民政策仍是问号

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中，波兰、匈牙利等部分中东欧国家曾以“难民摊派”不公、担心难民难以融入本国社会等问题为由，拒绝接纳寻求庇护的穆斯林难民，最终的结果是德国承担了绝大部分来自叙利亚的难民，并间接导致大量非法移民以偷渡的形式涌入地中海国家。而欧盟推动建立的“综合、可持续的移民和难民管理体系”也一直停滞不前，欧盟至今未能建立一个统一有效的难民分配机制。从法律上讲，难民首次入境的国家应负责处理庇护申请，这使得波兰、匈牙利和奥地利等处于欧盟边境或保守政党执政的国家一度拒绝接收难民。

德国内政部长南希·费泽尔日前乐观地宣称，此次接收乌克兰难民，欧盟成员国表现出了高效与果敢，这是欧盟难民政策“范式的转变”。但欧洲的舆论对此却有着不同的观点。德国《时代》周刊称，尽管欧盟现在正在使许多以前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但大多数欧盟官员仍认为，目前的情况只是例外，并不能代表欧盟的移民政策出现转变。保加利亚总理基里尔·佩特科夫说：“这些不是我们习惯中认为的难民，他们受过教育，没有‘不清楚的过去’，也不是可能的恐怖分子。”奥地利总理卡尔·内哈默说，这些人“不是典型的难民，而是需要邻居保护的欧洲人”。因此，这次乌克兰难民潮能否推动欧盟出台协调一致的难民政策，仍需打上一个问号。（据《光明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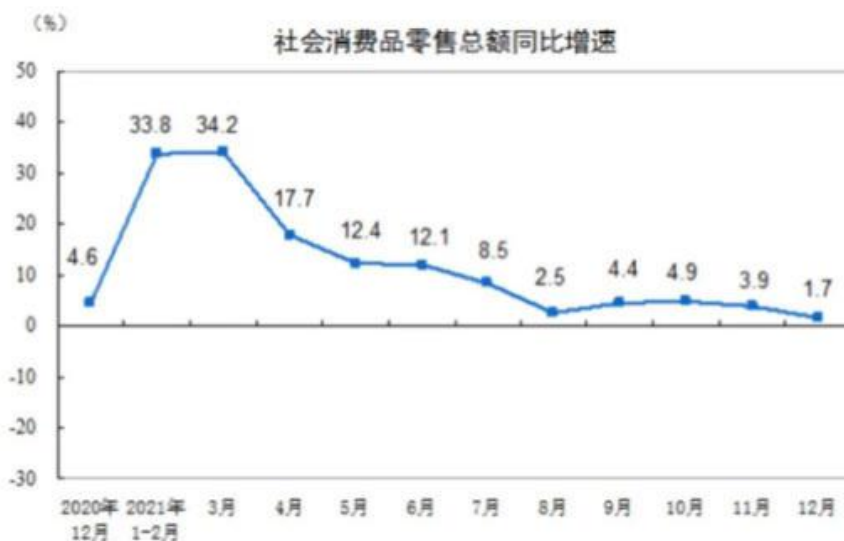
[Top](#)

华夏透视

善于学习的人懂得把观察、经验和知识转化为智能并使用得当，不仅能将梦想持之以恒，更懂得如何事半功倍。投资大师巴菲特在给其老师本·格雷厄姆的著作《聪明的投资者》所写的序言中说：“长年进行成功的投资并不需要极高的智商、罕见的商业洞见，或内部消息。真正必要的是做决策所需的合理的知识框架，以及避免情绪化侵蚀智识的能力。”本栏目力图提供一个中央高层动向及其影响分析与政经趋势分析相结合的框架，从而达到把握最关键、最重要的决策信息和决策要点的效果。可以说，我们的研究和分析也将因此得到升华。

【消费势头仍疲软 2022 稳消费面临压力】

2021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回落，四季度同比增速直线下降。目前全国20余个省市公布了2022年社零增速目标，多数持平或下调，也体现出了地方的谨慎预期。刘元春对此表示，四季度消费数据创下新低，表明消费疲软现象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复苏所面临的一个较大问题。



刘元春分析认为，导致这一局面出现的核心原因有以下方面：

第一，疫情导致相当一部分服务性消费的供求两端都出现较大萎缩。当前疫情呈现点状发散趋势，很多消费活动，特别是具有接触性的服务行业、文化行业、娱乐行业的活动大幅降低，即使在节假日期间，出行人数和餐饮数据的两年同比依然没有完全转正。其中，旅游业受疫情影响较重，2021年数据即使较2020年而言也没有明显增长，较2019年等常态时期而言还处于负增长。

第二，疫情及经济复苏阶段对于不同收入人群的冲击程度不同。虽然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5128元，比2020年实际增长8.1%，但从结构性角度来观察，会发现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水平明显低于平均水平。“需要注意的是，2021年对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实际增速显著低于我国GDP的名义增速，同时也低于经营性收入和投资性收益的增长速度。”刘元春表示，“事实上，疫情给中低收入阶层的工作收入带来了明显冲击，导致他们对于未来的收入预期和消费信心都受到很大影响。而中低收入阶层往往是边际消费倾向较大的人群，他们的收入增速无法达到预期，这是我们要高度关注的问题。”

第三，未来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导致居民预期疲软，审慎性的储蓄上扬并直接导致消费不足。

第四，受到供应链冲击的一些重点行业的消费也出现问题。以汽车行业为例，由于受到车载芯片短缺的影响，2021年我国汽车总产量减少150万-200万辆，总销量也出现了一定下滑。此次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继续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体现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对于国内车市恢复增长、拉动我国GDP增长的重要意义。刘元春对此认为，新能源汽车是重点行业消费中的一个重要因素，需要注意的是，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虽然出现大幅度上扬，但在汽车消费结构的转型期，新能源汽车也面临着一些供给瓶颈。“此外，我们也观察到，消费端还有一些中高收入人群的奢侈品消费也不及预期。”刘元春表示。

他认为，综合以上因素来看，消费疲软现象与相关消费刺激政策的过快退出不无关系。2020年以来，我国采取了一些超常规的消费刺激举措，但是在2021年一季度消费数据大幅上扬、乐观情绪开始弥漫之后，很多政策向常态化回撤，这也成了消费疲软的一个诱因。

■政策积极出台 消费增速或于三季度反弹



对于不及预期的消费形势，此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消费持续恢复”并主要部署了三方面具体措施：

一是促进生活服务消费恢复；二是稳定增加大宗消费，要继续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鼓励地方开展绿色智能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三是发展社区消费和县乡消费，包括加大城市社区生活服务设施建设力度，加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发展农村电商和物流快递配送等。

刘元春表示，消费疲软趋势一旦形成，或较难在短期内实现扭转，但国家对消费疲软问题非常重视，提振消费相关政策的积极出台能够起到一定作用：

第一，显著发力的宏观政策将使对于经济增长的悲观预期出现逆转。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今年工作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收入预期、消费信心的逆转将带动消费形势好转，消费（增速）下滑趋势或在一季度见底，二季度企稳，三季度反弹。”刘元春表示。

第二，供需两端多措并举，提振消费。目前我国针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低收入人群等特殊消费群体采取了一定举措，也在多方面征集消费刺激措施，包括对低收入群体进行消费补贴，对于疫情相关行业进行重点扶持等，同时加大力度缓解供应链瓶颈问题，以上举措都有利于提振消费。

第三，政策推动房地产相关消费企稳。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是国家已经在采取一系列消费信贷政策来促进房地产政策的稳定，例如针对市民购买家具、家电等活动合理提供消费信贷产品，这有利于与房地产相关联的消费行动的企稳。“整体来看，我觉得2022年整体消费并不能够完全回归常态时期，但消费政策会陆续展现作用，消费企稳现象可能发生。”刘元春表示。

■解决房贷影响下的家庭资产负债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2021年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我国有负债的家庭占比为56.5%，平均每户家庭负债51.2万元。有观点认为，我国家庭债务中的七成集中在房贷上，结构性问题较为突出，已经影响到社会终端消费需求。疫情以来，国内居民的收入支出结构、债务结构也出现恶化。

刘元春对此表示，2008年以来，我国以抵押贷款和消费信贷为主体的个人负债大幅增长，导致居民负债率大幅提升，2021年居民负债所占GDP比例已经高达60%，同时也达到了居民可支配收入100%以上的水平。居民收入被大量用于购置房地产，造成了明显的消费挤占现象，因为房地产购买这一行为属于投资而不是消费。同时，大量的钱被用于采购房地产相关耐用消费品，也会导致其它领域消费不足，这是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刘元春提到，造成居民的高负债率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贷款利率的高企，即居民背负着沉重的利息负担。

因此，如何有效解决房贷影响下家庭资产负债的结构性问题，实际上是缓解居民负债、促进居民消费的一个关键点——

第一，要稳房价，使房地产市场回归“房住不炒”的基本战略定位。因此，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一定调控以稳定价格是很有必要的。

第二，对于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需求，要加大“看得见的手”的力度。加快完善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使中低收入阶层能够以较低成本享受到福利住房。由此，也能够释放部分中低收入阶层的资金用于消费。

第三，贷款利率需要保持在一个相对适应或者较低的水平，从而降低居民债务负担所带来的利息压力。

“总的来说，房地产长效机制的建设对于缓解我国居民负债问题会有一定帮



助。”刘元春表示。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了“继续保障好群众住房需求”的要求。报告提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坚持租购并举，加快发展长租房市场，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 财政货币政策精准发力 不断开发消费新业态

对于局部疫情时有发生的情况，本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继续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科学精准处置局部疫情，保持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刘元春表示，如果疫情持续呈现多点发散的态势，或将在中期对经济复苏带来系统性的影响，拖累潜在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疫情加重了居民的心理负担和预期不确定性。他提出，人们的收入支配情况不仅取决于对于未来收入的总量判断，也取决于对于未来支出环境的判断。未来环境的不确定性越强，人们审慎性的储蓄就会越高，因此消费支出就会越低，这是一个必然现象。

“因此，疫情防控坚持科学精准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经济持续复苏、收入持续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我国要充分发挥制度优势，使科学防疫与经济复苏能够相融而非冲突。”财政政策方面，刘元春认为，对于受疫情冲击严重的区域要有重点扶持，对于财政运转比较紧张的基层政府也要进行直达资金的相关安排。“很多收入补贴举措依赖于国家政策，而国家政策在不同区域的差异是很大的，因此要有一些特殊安排。”货币政策要与财政政策有所配合，对于居民的利息负担要有所调节。消费信贷成本的进一步下降非常重要，这也有赖货币政策进行调节。此次报告提出，货币政策需“推动金融机构降低实际贷款利率、减少收费，让广大市场主体切身感受到融资便利度提升、综合融资成本实实在在下降”，也体现出了对于降低利率以满足更多信贷需求的要求。“我们国家要根据扩内需战略制定提振消费的一揽子战略举措，这些举措不是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就能完成的，整个十四五期间都要有这些举措。比如，对一些特殊人群采取收入补贴政策，在一些局部区域发放消费券，推动大宗商品消费下乡活动并对农村消费给予扶持政策等，这些都在国家扩内需战略的工具箱之中。”

刘元春表示，这些举措需要财政和货币政策全面地给予支持。“我们会看到，许多政府很善于做投资，但不善于做消费，因此政府工具箱的选择还需进行创新，政策的传导路径还需不断疏通，练就各级政府有效扩大消费而不是简单做大项目的的能力。”刘元春还建议，要不断开发消费的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使整体消费模式能够抵御疫情影响，比如现在的电子配送、无人超市等，对于居民消费秩序的正常化都会有很大作用。

■ 改善收入分配结构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刘元春表示，结合共同富裕远期目标来看，调节收入分配政策是我国扩内需、扩消费最为基础最为重要的一项举措。

首先，初次分配环节要更加有利于劳动者而不是以资本为中心，关键在于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

他分析认为，我国消费偏低，是因为国家消费基金偏低，这与我国“穷居民、富企业、强政府”的收入分配格局密切相关。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只有46%-47%，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我国企业留利占GDP的比重在20%左右的水平，如此之高的企业留利导致大量上市公司的利润没有分红，大量国有企业的利润没有转换成国家消费基金，而是直接转换成了投资基金。因此，合理处置企业利润分红十分必要，国有企业的利润上缴到中央政府进行支配也很关键。



第二，再分配环节中，税收结构应从过去以流转税为主体，向以所得税、财产税为主体转换。

刘元春表示，目前再分配环节中的综合税负偏高，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导致这些综合税负都由消费者来进行最终支付，而不是高收入或者高财富者来进行支付。“因此，税收结构的转换很重要”。

第三，要建立具有法制性的，通过社会、道德、文化进行引导的第三次分配体系，从而使整个社会的消费基金比重有一个明显提升。居民消费能力难以释放的另一部分原因，体现为居民在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等方面还存在很多后顾之忧。本次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展望未来，应如何扩大公共服务供给、完善消费环境？

刘元春认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导致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等问题普遍存在。如何均衡提升教育质量、医疗质量以及促使养老服务更为普及、更加廉价，都还需要国家在供给侧上做文章。特别地，还有大量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没能得到满足，在房地产存量调整的过程中，很多居民可以通过租赁服务来满足住房需求，但是目前我国租赁住房市场很不规范，这方面消费潜力的挖掘有赖于推进住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

但需注意，许多公共服务属于半公共产品。一方面，需要政府加大对于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另一方面，还需大力进行机制体制创新，通过市场化方式解决半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这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难题，同时也是收入分配体系改革的一个难题。谈及我国消费潜力，刘元春表示，一些针对中高端消费需求的服务供给还处于短缺状态，与养老相关的康养产业也处于供给短缺状态。此外，随着科技的进步尤其是5G和6G的进一步普及，消费端所能产生的新形态、新模式、新产品可能是超乎想象的，这就要求允许一些资本在相关前沿领域进行探索。

【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作者：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

[Top](#)

**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我们的客户——
提升竞争优势，共同创造持续长远的收益**